

大家小说

江定仙先生与《康定情歌》

王次昭



1992年，王次昭（左）与江定仙在上海的合影

大家一定知道《康定情歌》这首民歌，或许还知道这首民歌的另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民歌不仅在民间传唱，而且还是专业舞台上歌唱家们常选的曲目，无论是民族歌唱家，还是美声歌唱家，甚至是流行歌手，都往往把它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首民歌开始传向海外，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国外歌唱家演唱中国歌曲最多的一首。然而，这首民歌来自哪里？为何能广泛传唱？《甘孜报》和《羊城晚报》都曾征集过文章，试图找到真相。有人说《康定情歌》是王洛宾创作的，也有人说是罗念一创作的；有人说是康定人李天禄创作的，甚至也有人说是画家丰子恺创作的。这些猜测和误传，显然会让人们对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来历错解，甚至也会对这首民歌为何流传全世界感到迷茫。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记者郭昌平，经过20多年的调查、采访和研究，撰写了题为《我们的〈康定情歌〉》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告诉人们，这首民歌的创作者、编配者和传播者，均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四位老师和一位学生。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康定情歌》是一首流传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的民歌。所谓民歌，即民间集体创作的歌曲，《中国音乐词典》里这样解释民歌：“在群众口头的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因而，民歌的词曲作者很难得到考证，但民歌的记录者和被记录的演唱者是可以确定的，民歌的改编者、编配者和传播者更可以确定。据江定仙、王震亚、喻宜萱等教授回忆，《康定情

歌》是抗战时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声乐系学生吴文季采集记录的。江定仙先生曾经委托女儿江桥，在回复郭昌平的信中说：“这首民歌是当时的一位学生，参加西昌地区的活动带回学校的，由伍正谦转交给我，这首曲子具有很好的和声和旋律，我很喜欢。后来我对其进行了精心的编配工作，交给同学花腔女高音喻宜萱演唱。”江定仙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编配〈康定情歌〉的》中回忆说，男高音歌唱家伍正谦为了开独唱音乐会，请江定仙为这首民歌配伴奏。江定仙不仅完成了编配，还亲自为他的音乐会弹伴奏。喻宜萱先生在《深深的怀念——纪念江定仙先生90诞辰》文中曾经回忆说，1947年她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一场独唱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上，我第一次演唱了江定仙先生改编的民歌《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受到听众热烈欢迎。自此以后，我在各地陆续举行独唱音乐会，以及1949年在巴黎和伦敦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都少不了这首歌曲。”

王震亚先生当时是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山歌社”的倡导者，他也曾对《康定情歌》有一段回忆。王先生撰文回忆说：“1945年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受延安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影响，在学校开展了编配、演唱民歌活动，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一活动得到江定仙教授的热情支持，他不仅为出版的《中国民歌》写了序言，还亲自动手为西康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写了伴奏。为写这样一首小歌的伴奏，他闭门数日，是精心之作，所以一经问世，就广泛流传，近40年来在国内外传唱，一直到今天。”

根据三位教授珍贵的历史回忆，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首民歌能够得以流传的历史背景和记录者、编写者和传播者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试想，假如没有山歌社的活动，也许就没有当时国立音乐院学生热心采集民歌的举动，和出版刊有《康定情歌》的《中国民歌选》；假如没有吴文季的记录，这首民歌也可能只在民间传唱；假如没有江定仙先生的编配，《康定情歌》很难成为专业歌唱舞台上的常选曲目；假如没有喻宜萱先生，首先在欧洲巡回演出时演唱这首民歌，恐怕它也不会海外产生影响。这一连串的假设，归根结底一句话：《康定情歌》的流传，是由于当时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几位专业音乐家，通过不同方式努力的结果。这一切事件，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与江定仙先生有关。江定仙先生当时是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山歌社

的活动主要是作曲系王震亚等学生倡导的；《康定情歌》由男高音歌唱家伍正谦首演时，江定仙先生不仅为这首民歌编配钢琴伴奏，而且还亲自登台演奏；《中国民歌选》的出版也是在江定仙先生的支持下完成的，江定仙先生不仅提供由他编写的《康定情歌》，还亲自校对全部作品并写序言。后来，喻宜萱先生在南京首演这首民歌时，又是江定仙先生为她弹的伴奏。但所有这一切，最核心的环节，还是江定仙先生为《康定情歌》编写了十分精致的四段钢琴伴奏。正如喻宜萱先生所说：“但最根本的，一来是这首民歌本身具备的优越性；二来是江定仙先生的精美配乐，高明的艺术加工，使原来就很优美的歌声，穿上一件裁剪合体、制作精巧巧妙的漂亮服装，使这首活泼动人的民歌更加完善，得以广泛传播。”

《康定情歌》作为吴文季整理记录下来的民歌原型，应该是一首四段歌词的分节歌，曲调只有十四小节。在江定仙先生的精心编配下，成为一首民歌风格的艺术歌曲。江定仙先生将不同歌词的四个唱段，根据歌词的表达内容，配以不同的钢琴伴奏，再加上简短的前奏和尾声，把这首歌曲的音乐结构扩展到六十八小节。虽然歌唱部分的旋律是重复的，但每一段歌唱的伴奏，都配以十分精致并各不相同的钢琴演奏。从钢琴伴奏的和声和织体来看，虽然没有惊人之处，但它恰恰是这首民歌朴实、深情的风格体现。乐曲开始的4小节前奏，右手是主题的提示，左手则用四、五度音叠置成的和声，配以清新柔和的节奏背景，让听众从一开始就感受到这首民歌“质朴、含蓄的感情特点”。之后的4段音乐，每一段都随着歌唱的情感变化而变化。第一段沿袭了前奏质朴的民歌风格，前半部分的伴奏与前奏保持一致，后半部分依然是平稳的织体，但节奏型作了变化，给人一种期待感。第二段在高音区用琶音演奏的手法，和声上也做了变化，表现出诙谐和挑逗的情趣。第三段的伴奏是一个融合型的织体，高音是8度的主旋律，低音则采用了第一段后半部分具有期待感的节奏型；这似乎是这首民歌音乐发展的必然，体现出情感从朴实到挑逗，再到期待的自然流露过程。可见，江定仙先生为编配这首民歌的用心，他把自己完全融入歌唱的情感之中。第四段的伴奏与歌唱形成对比，钢琴的模仿略有变奏；两者形成互为对歌的场景，把这首民歌的音乐推向高潮。最后是简短的尾声，在一个扩展了一倍时值的节奏中结束全曲，给人无限的回味。王震亚老师曾经这样评价江定仙先生为《康定情歌》的编配，他说：“全曲简洁而丰富。乍听似乎无惊人的和声效果，但空四、五、八度、平行和弦和小七和弦的运用，和弦三音的省略以及和弦连接的精心处理，使伴奏部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这首民歌十分协调。”

《康定情歌》在民间流传的年代无法考证，但它走进歌唱舞台，至今已有76年；走向世界舞台，至今已有73年。要不是康定籍作家郭昌平的追寻，恐怕这首民歌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至今是个谜。受江定仙先生之子江自生先生的委托，要我写一篇文章，再把《康定情歌》得以传播的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从这首民歌得以流传的每一个环节来看，江定仙先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江定仙先生为《康定情歌》的精心编配，是这首民歌走上国内外音乐舞台的关键。作曲系王震亚等学生组建“山歌社”，江定仙先生是时任系主任；《康定情歌》的整理记录者吴文季，是受“山歌社”的影响而热心采集民歌；这首民歌由歌唱家伍正谦首次在舞台上演唱时，是由江定仙先生编配和伴奏的；江定仙先生又为出版《中国民歌选》写序、校对并提供《康定情歌》的编配谱；江定仙先生后来又向喻宜萱先生推荐由他编配的《康定情歌》，通过喻宜萱先生将这首民歌带到海外巡演。假如没有以上这些环节，《康定情歌》就会像成千上万的民间歌曲一样，仅仅在康定地区的民间传唱。当然，也许会有其他人能为此作出类似的贡献；但是，历史的责任却落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几位教授和学生身上，江定仙先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2021年4月10日于北京

（江定仙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王次昭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学海星光



袁行霈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众多集体心血凝结而成的文化成果，给后世树立了学术典范，提供了精神滋养。这些文化成果，或者由某一个学术机构集体完成，或者由某一位或多位学者大贤主持编撰，有时甚至是最高统治者亲自倡导或下令敕编。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资治通鉴》，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全唐诗》、《四库全书》以及历代官修正史等。

袁行霈先生个人独立完成的丰硕而精深的学术成果之外，还有不少由他主编或参与的集体项目。先生以其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富有亲和力的组织才能，团结广大学者，齐心协力，不负众望，完成了多个大型的集体项目，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些集体项目是当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收获，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认知。

袁先生主持的这些集体项目，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负责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期间所开展的集体项目，包括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大型系列片《中华文明之光》和主编面向青少年的8卷本《中华文明大视野》；主编《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文明传播史》；主编《新编新注十三经》；主编大型期刊《国学研究》，等等。二是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期间，主编的《中国文化地域通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等。三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受中宣部委托，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等。

以上这些集体项目成果，都没有收入《袁行霈文集》中，仅将先生亲自撰写的各书序言或绪论汇编为《文集》的第八卷，这就是先生称之为“大时段研究”的《彙集》。

下面，选择几种较为重要的集体项目略做介绍。

其一，《中华文明之光》。这是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改称国学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系列电视片，共150集。当时健在的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等亲自撰稿、讲解，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民俗、天文、地理、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语言，讲述了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欢迎。随后，图文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整体字版在香港出版，韩文版在韩国出版。另外，改编为青少年版的《中华文明大视野》，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后，2003年获得国家图书奖，2004年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次面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其二，《中国文学史》。袁先生主编的这套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编的普通高校文科教材，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成果，在全国高校影响很广，多次再版。正如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在融合以往各种文学史优点的同时，又汲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具备了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出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其三，《中华文明史》。此书是为了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而编撰的。在袁先生的倡议下，与张传玺、严文明、楼宇烈几位北大教授共同主编，充分发挥北大人文学科的综合优势，从文、史、哲、考古四大专业方向中遴选了36位专家学者，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系统阐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此书已有英文、日文、俄文、韩文、塞尔维亚文、匈牙利文等6种外文译本，都是由国外汉学家翻译并在国外出版发行，为推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该书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

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百项精品成果奖。在此基础上，袁先生又提出编撰此书的姊妹篇——《中华文明传播史》，组织国内外学者参与工作，已于去年正式启动。

其四，《中国文化地域通览》。袁先生自2006年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以来，倡议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部大书。该书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各地文史馆的近千位学者历时八年通力合作完成。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共34卷。每卷分上编、下编，上编纵论历史，叙述文化发展历程；下编横分门类，介绍文化特色。此书的编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成为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和文化名片。各地的历史源流、乡邦文献、文化名人、民情风俗等，尽收眼底，体现了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

其五，《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自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得到空前重视和加强。由袁先生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就是其中一项重点工程，被确定为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在国家图书馆设立专门办公室，前后两任馆长协助袁先生，担任编委会副主任，袁先生任主任。编委会成员包括魏建功、陈祖武、陈来等著名学者，另有饶宗颐、冯其庸、叶嘉莹、章开沅、张岂之、王蒙等担任学术顾问。《百部经典》，从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中精选100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包括经、史、子、集和科技、艺术、宗教各个门类，每部著作邀请一位对该部著作素有研究的学者进行解读，力求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激活经典，熔古铸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优秀传统文化贴近时代，贴近生活。通过五年的努力，现已出版40种，今年夏季再出10种，共达50种，预计“十四五”期间全部完成。

通过以上所列，足以看出袁先生主持的集体项目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影响之广，贡献之巨！本人曾有幸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工作（忝列编委），亲身体会到先生的组织才能和学术风范。在我看来，袁先生主持的这些集体项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大多是填补空白的项目。袁先生主持的这些集体项目，无论是先生亲自倡议还是受上级委托，选题都具有开创性、前沿性、高端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例如，《中华文明之光》就及时抢救了北大诸多学科的老一辈学者，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面容笑貌通过电视的形式，诉诸民众，留诸后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传播史》等项目，更是前无古人的首创之功，其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多学科交叉，体现了“纵通”与“横通”的学术风格。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学科的交叉与融通，这与先生一贯的治学主张，强调“纵通”与“横通”的学术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编写《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汇集众智 嘉惠学林

——写在《袁行霈文集》出版之际

王能宪

的时候，遇到《黄帝内经》《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书籍时，袁先生总是让办公室邀请相关专家与编委会成员一起学习讨论。编撰《中华文明史》，30多位各门学科的学者，召开了大大小小60多次讨论会，每次讨论会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互融的学术平台，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辩难、相互启发、集思广益。这样，既能促进各学科的学者相互学习交流，又能较好地保证项目的学术质量和水准。

第三，注重学术民主，不做挂名主编。主持集体项目，如同统率千军万马，既要有总揽全局、指挥若定的气魄；又要虚怀若谷，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发挥每一位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袁先生十分注意发扬学术民主，汲取大家的智慧。他主持《百部经典》的编委会，认真讨论每一部选目，遴选每一位解读人和书稿审订人，都要求每位编委充分发表意见。去年因为疫情，编委会不能集中开会，就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充分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再做决定。袁先生作为主编的所有项目，都要亲自拟定大纲和体例，参与撰稿和修改定稿，撰写序言或绪论，绝对是每一部著作（或成果）的灵魂和主脑，从来不做挂名和空头主编。

第四，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袁先生为人谦和，温厚儒雅，凡是与他接触、相处的人，都能感受到先生低调做人、谦谦君子的人格魅力。在当下学风浮躁，许多集体项目开展起来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袁先生主持的项目却都能顺利推进，圆满完成，这与先生的德望、学识、特别是人格魅力大有关系。《百部经典》已召开过30次编委会，袁先生作为主持人，总是那么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总是能让大家各尽所言，如沐春风；总是尊重每一位编委的意见，准确把握方向，顺利向前推进。曾经参与《中华文明史》编撰的作者，深情回忆那段时光，大家由衷地表示：参加《中华文明史》的编著，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工作经历和难得的学习机会，如同系统地学习了一个文明史专业，受益匪浅。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袁行霈文集》